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頁103~12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 骸骨與銘刻
## ——論黃錦樹、郁達夫與流亡詩學*

高　嘉　謙**

### 摘　要

郁達夫是馬華文學史上重要的南來作家，1945 年在印尼失蹤，傳奇經歷在馬華文學內部留下魅影般的想像和迷思。事隔多年，在台馬華作家黃錦樹以系列「重寫郁達夫」的小說，透過後設、戲謔等手法改寫郁達夫的南洋傳奇，試圖顛覆馬華文學線性史觀，開啟文學書寫的「慾望生產」，重構另一種的文學史「現場」。本文透過以下三個脈絡的討論：失蹤、死亡、骸骨三者如何組合有意義的符碼，再現早期流寓者的歷史時空和文學魅力？重寫意圖展現的肉身和亂離體驗，如何導向馬華文學裡特殊的流亡意識或流亡詩學？骸骨和肉身的辯證，如何轉換成作者對中國性和漢字有意識的銘刻？藉此三點論證黃錦樹的「重寫郁達夫」有意識地指向馬華文學內蘊的歷史骸骨和創傷。

本文最後論證黃錦樹在旅台位置重寫郁達夫的南來，勾勒文學播散（dissemination）和慾望的地誌書寫，顯露出馬華文學流動、曖昧身世、跨界的文學現象。

關鍵詞：郁達夫　黃錦樹　馬華文學　骸骨　流亡詩學

---

99.08.15 收稿，100.03.03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黃錦樹、郁達夫與馬華流亡詩學〉曾宣讀於「離散與亞洲小說研討會」（“Colloquium on Diaspora and Asian Fiction”），國立中山大學離散／現代性研究室主辦，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8年1月14日。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給予的專業意見和指正。

** 臺灣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顆時代錯誤者的骸骨
流浪在年復一年的雨季中
吞下虛無縹緲的思鄉暴雨
永遠死去的雨林
沒有一個神位
可以容我安身立命

林幸謙〈郁達夫的血肉紅塵〉[1]

## 一、流亡・詩學・文學史「現場」

「郁達夫的死是不幸的，但又是悲壯的，閃耀著愛國主義光輝的。」[2]

這是當年跟郁達夫一起隱姓埋名，流亡在蘇門答臘的胡愈之在郁達夫失蹤四十年後的紀念會上的公開講話。這同時是一次對郁達夫的南洋歲月的定調和總結。他爲我們歸納了郁達夫遇難的原因：「他掌握、收集了日本憲兵在戰爭期間虐殺無辜、殘暴作惡的大量罪證。」因此進一步佐證了郁達夫這位新文學作家在戰爭時期的貢獻。從二戰期間新馬與中國文藝界的互動關係來看，郁達夫在戰時肩負文藝界抗戰的使命。[3]他在新加坡文化界領導抗日，卻死在印尼的日本憲兵手下，成了殞落在邊陲南方的一顆五四文學明星。郁達夫的南洋悲劇，反而有了一種政治正確。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中國大陸的郁達夫論述轉而將其定調爲「殉國烈士」、「愛國詩人」、「文化戰士」等角色，編輯《郁達夫抗戰詩文鈔》，甚至給予「全人」的讚譽。一個在赤道線上抵死抗日的愛國作家，成爲現代文學刻劃苦難，狀寫現實的範本。[4]

1 林幸謙，〈郁達夫的血肉紅塵〉，《叛徒的亡靈》（台北：爾雅，2006），頁54。

2 胡愈之，〈郁達夫：愛國主義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收入李杭春、陳建新、陳力君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上冊）（杭州：浙江大學，2006），頁206。

3 郁達夫編輯《星洲文藝》時提及「《星洲文藝》的使命，是希望與祖國取聯絡，在星洲建樹一文化站，作為抗戰建國的一翼，奮向前進的。」詳氏著，〈《星洲文藝》發刊的旨趣〉，收入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1985），頁597。

4 郁達夫身後的聲名，以及「經典化」過程，詳陳福亮，《風雨茅廬：郁達夫大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2004），頁1398-1434。1977年在新加坡出版的《郁達夫抗戰論文集》已從抗日的思想行為肯定郁的愛國主義精神，詳方修，〈《郁達夫抗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早在郁達夫失蹤的隔年，他有一組十一首的〈亂離雜詩〉由胡愈之在戰後發表悼念文章〈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1946）[5]時一起披露，因此成爲郁達夫生命中最後的文獻，銘刻流亡的身體與心靈。但「出土」文獻如何還原、再現經驗主體，無異掉入另一種詮釋的陷阱。當時郁達夫已杳無音訊，〈亂離雜詩〉藉由他人之文而浮出地表，建構並脈絡化爲郁達夫流亡和失蹤的環節，成爲遺物，在其物質性的基礎上反而生發了無限的慾望生產。郁達夫的失蹤或死亡，因此走入文學敘事的範疇，在馬華文學內部留下想像的空間。恰如那不知所蹤的肉身或骸骨，郁達夫愛好舊體詩且自稱「骸骨迷戀者」[6]，〈亂離雜詩〉因此「光明正大」表徵骸骨，以遺文遺物的形式釋放出流亡者浮動卻也曖昧的個體亂離經驗。[7]

一九三八年郁初抵新加坡擔任《星洲日報》的副刊編輯，扮演著一個文人與報人的稱職角色。當時他的編輯工作異常吃重，在主編《星洲日報》副刊《星洲日報半月刊》時，幾乎每期都要自己撰寫文章，討論日本問題。同一時期他還主編了新增的《星洲文藝》專欄，並且發表文章。除此，他另外主編了三種純文藝副刊《晨星》、《文藝週刊》和《繁星》，甚至後來每月一冊的《星光急報》文藝欄也是由他負責。他的名氣與號召力是被賦予重擔的原因，過份的忙碌與消耗，甚至有過兩個月要看一千篇稿子的紀錄。在抗日行動方面，他投入抗日賑籌會的活動，幫助殖民地政府主編《華僑日報》宣傳抗日，進而在文化界抗日聯合會擔任主席。另外，他還聯合當地學者許雲樵、姚楠等人組織南洋學會，開啓了南洋風土研究的風氣。以上多重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尤其海外宣傳抗日的使命，使得郁達夫的小說家生命提早枯竭，因應時勢大量寫作政論、雜文和散文，並經營篇幅短小的漢詩，成了詩人。

---

論文集》序〉，收入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2010），頁471-474。對於透過「全人」的稱譽，以肯定郁的愛國本質，詳王孫、熊融，《郁達夫抗戰詩文鈔》（福州：福建人民，1982），頁1-5。

5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收入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三聯，1985），頁41-78。

6 郁達夫，〈骸骨迷戀者的獨語〉，《郁達夫全集・卷三》（杭州：浙江文藝，1992），頁82-84。但這不僅是郁達夫的個人稱號。新文化運動以後，寫作舊詩者都習慣性被譏為迷戀骸骨。見鍾敬文，〈《天風海濤室詩鈔》跋語〉，收入楊哲編，《中國民俗學之父》（合肥：安徽教育，2004），頁163。

7 關於郁達夫在新馬與印尼期間的漢詩寫作，相關討論詳拙作《漢詩的越界與現代性：朝向一個離散詩學（1895-1945）》（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的第六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軍臨城，郁偕同友人撤離星洲往印尼蘇門答臘展開逃亡之旅。他們先後停留了卡里曼島（Karimun），石叻班讓（Selat Panjang）、孟加麗（Bengkalis）、保東村（Pulau Padang）等地。當時由於荷蘭殖民政府不發簽證讓他們前往爪哇，以致返回中國的願望落空，一行人只能在當地華僑的協助下不斷輾轉逃亡。郁等人在保東村居住了一個半月後，蘇門答臘及附近島嶼陷入日軍手裡，爲躲避日本密探追捕抗日份子，他們又繼續逃難到蘇島中部的北干峇魯（Pekanbaru），最後到達巴爺公務（Payakumbuh），並定居於此。郁在蘇門答臘期間只能化身酒廠老闆趙廉，周旋在日軍、印尼人、荷蘭人及華僑之間。因爲懂得日語，期間他還擔任了日本憲兵部的翻譯。儘管流亡在外，他的頹靡風流不減，嫖妓頻繁，且遊走於各式各樣的妓寮。[8]以致看在一同流亡的另一位五四作家巴人（王任叔）眼裡，郁的行徑就是「名士的路」。[9]

綜觀他遊走星馬、印尼期間的精神形軀幾乎消耗在抗日、應酬、避難、流亡的忙碌慌亂中，而個人生命也歷經著家變、情傷、再婚。除了政論性質的抗戰文章，女人與詩恰是他的喪亂際遇的紀錄與寫照。對於一生中經歷的荒唐頹廢和流離恐懼，郁達夫曾刻有石章「生怕情多累美人」誇言自己的風流；而臨近生命的終點，他在巴爺公務寫下詩句：「此身真是劫餘灰」。[10]死寂、湮滅，一幅離散者的末世圖景。這是郁流亡的最後據點，也是失蹤之處。從文學的隱喻而言，詩裡的郁達夫形象竟是他留給世人最後的骸骨。

然而放在文學史的視域當中，郁達夫的「失蹤」，卻意味沒有歸程，看不到流寓的終點，成了我們觀察南來文學與區域文學互動，具體有效的一個「現場」案例。晚清以降，從中國到南洋的南來文人絡繹不絕，開啓了文化的播遷旅程。郁達夫留下的漢詩遺產，是詩人域外行蹤的紀錄，文獻式的流動地理。這些集合異地經驗與主體流離感受的漢詩，可視爲「海外華文文學」的原始文庫，敘述流寓、流亡經驗史的第一手材料，鋪陳區域漢文學播遷與發展軌跡的人文譜系。[11]同時作爲構成區域文學交流，刺激各個文學場域在地化生產的起

8 當地華僑見證了郁達夫的風流事蹟。詳張紫薇，〈郁達夫被害前後〉，收入王潤華編，《郁達夫卷》（台北：遠景，1984），頁344。

9 跟其他同行者的悼念不同，巴人語帶厭惡的期許後代對郁的名士情調的超越，並以為「我們是不必為達夫悲哀的」。王任叔，〈記郁達夫〉，收入李杭春、陳建新、陳力君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上冊），頁58-88。

10 郁達夫，〈胡邁來詩，會有所感，步韻以答〉，《郁達夫全集・卷九》（杭州：浙江文藝，1992），頁223。此詩乃1944年寫於蘇門答臘。

11 從晚清以降文人流寓新馬地區的漢詩作品，目前可見李慶年的整理和討論。詳氏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點。

嚴格說來，在抗戰期間南來謀生，輾轉流亡印尼的郁達夫，可以看做南來文人譜系中，最能引發聯想和蠱惑人心的個案。他有著傳奇般的生命經歷，做爲揚名五四時期的小說家，在奔走絕域，陷入精神困窘的生命晚期，反而成了標準的漢詩寫作者，一位流亡詩人。他的生命危機有著不可抗逆的戰爭暴力，情感受創的頹靡感傷，以及背負抗戰使命卻落荒而逃。在新加坡投稿發表〈毀家詩紀〉終導致妻離子散，藉詩投射屈原行吟澤畔的流放原型：「投荒大似屈原遊，不是逍遙范蠡舟」，同時質問奔走天涯的痛苦：「窮來欲問朝中貴，亦識流亡疾苦否？」。以上種種虛耗在歷史時空的無力感，個人的進退失據，令他的精神與肉身都接近於一種「遺民」症狀。他成了被棄置在邊陲絕域的文化人，以漢詩滋養在動盪的時代裂縫中苟活偷安的身軀與心靈。

可是他最終死在南方，骸骨不知去向。這樣的結局，寓言式的回應了晚清以降整體流亡在中國現代性歷史風暴的文化人的處境。作爲戰爭下的難民，在郁達夫最能刻畫生命煎熬的歷史時刻，他選擇漢詩，一種棄置在現代文學建制和視域之外的文學形式，反而映襯出舊形式的誘惑。[12]相對在中國境內的大後方，抗戰氛圍中的漢詩寫作成了新文學家的一種精神症狀（郭沫若、茅盾等），這種抒懷與寄存人生體悟的文學形式，有效成爲他們敘述主體經驗的共通媒介，帶有生命與文化審美價值的人文形式。而遠在南洋的郁達夫，在一個強烈期待新文學抗戰形式的南方，[13]郁的漢詩情調（酬唱、毀家、情變的基調），預示了郁達夫的文學意義，只能轉向一個以個人生命經歷爲基礎，一種肉身型態的文學慾望。因此，放在文學史的論述框架，郁達夫南來的寫作與生命經歷的「症狀」，暴露出他作爲一個「文學現場」的意義。

現場，從實證的角度觀察是一個追尋歷史蹤跡的場所。然而，若現場不指向蹤跡，而是從生產與發生意義的層面著眼，文學史「現場」就意味文學產生影響與論述開展的一個蹤跡展示的所在。換言之，寫作漢詩與漢詩情調呈現的文學症狀，郁達夫晚年生命歷經的身體和生活困窘，以及他的失蹤；這些在心

《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1998）。

12 關於舊體詩與新文人的關係，劉納對此議題有過局部討論。詳氏著，〈舊形式的誘惑:郭沫若抗戰時期的舊體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1991),頁188-202。

13 當時南洋文藝界對文化人的南來頗多微詞和批評，認為文化人應留在祖國抗戰，非逃到南洋避難，顯示出他們對郁的南來略有責難，但也期待郁的到來可以提振南洋文藝界的抗戰氣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史意義下可以表徵郁達夫面對語言與克服流亡時間的細節和脈絡，補強了文學史書寫看不見的「現場」。晚清以降中國「大作家」的南來北返，大體皆屬過客，加上部分移居終老在此炎荒之地的，基本形塑了戰前馬華文學的基本規模。郁達夫的「南來—失蹤」，在戰爭時期的顯著角色[14]和慘澹歲月，在文學史裡被記取與被遺忘的，卻在期許「大作家」的南洋炎荒之地，製造了一個頗爲怪異，卻值得重視的文學「狀態」。在南來架構下的馬華文學視域，郁達夫個案有了一種生產意義，指向了馬華文學「離散敘事」（diaspora narrative）發生的歷史和文學現場。這樣的現象指出了一個馬華文學內部隱然存在的流亡詩學面向和可能的型態。

## 二、慾望生產：黃錦樹的離散書寫

除了一般的文史論述，最早對郁達夫現象提出「生產性」意見的，當屬馬華在台作家黃錦樹。兼具小說家與學者身份的他，爲我們下了一個曖昧的註解：「死在南方的郁達夫在星、馬、印華文文學的始源處鑿出一個極大的慾望之生產性空洞」。[15]這一段話可以看做本文著眼文學「現場」的一種延伸解釋，尤其黃錦樹自己還爲這個「慾望生產」進行了文學性的實踐，以小說重塑郁達夫。當骸骨不知所蹤，文字無法確切銘刻紀錄死亡，失蹤的郁達夫似乎成了南方「現場」的文學幽靈。他或以愛國抗日作家的傳奇形象出現在熟悉的文學史論述，又或者成爲南洋文學與文化論述當中一則離奇的軼事及回憶。然而，當這具文學幽靈，出現在二十世紀末的小說世界，預告了一種帶著慾望的想像敘事將重新改寫郁達夫傳奇，爲文學史論述中已成樣版的郁達夫，進行顛覆並組合血肉清晰的新形象。這同時是一次郁達夫留下的文學現場的延續或再生產。

郁達夫走入小說的虛構世界，也是始於黃錦樹。他出生於馬來西亞，八十年代後期來到中文教育和文學建制相對健全的台灣，取得大學和研究所學歷。爾後在台灣的大專院校教書，娶妻生子，從一個馬華青年邁入不惑之年。他旅

14 郁達夫在星馬地區的抗日事蹟與大作家的影響力，一般成了論者總結他在南洋歲月貢獻的印象。但流亡的慘澹，漢詩的晚期風格，卻沒有形成理解郁達夫在新馬文學的意義。前述的普遍印象詳孫逸忠，〈郁達夫戰時對星馬華文文學的貢獻〉，收入莊鍾慶編，《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福建：廈門大學，1991），頁146-160。

15 這是黃錦樹首篇在馬華文學的南來框架下討論郁達夫的論文。詳氏著，〈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台北：麥田，2006），頁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居台灣二十餘年的光景，卻以驚人的爆發力成就了豐饒的文學與學術事業。[16]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從大馬的南方小城居鑾，輾轉定居到台灣中央山脈旁的小鎮埔里，兩處皆屬邊陲地域，似乎提示了他偏好的生活地理，以及心態處境。「南荒」顯然不曾對他構成障礙，甚至成爲他思考邊緣和域外情境的創作動力，以致他長期經營一種從邊陲發動想像與破壞力的獨到文學與學術視域。

黃錦樹處身台灣卻沒有遠離南洋情境。他的小說創作持續保持對大馬政教環境、華人生存寓言和歷史傷痕的書寫，關注馬華文學生態、華人移民的處境和命運，同時在大馬及台灣兩地推動馬華文學論述，成爲創作與論述並重的在台馬華作者。然而，黃錦樹的成績並非只有單一的馬華面孔，他的學術研究同時深入兩岸三地現當代文學，上接晚清的學術與文學範疇，以紮實的功夫在台灣的主流學術場域站穩腳步。這些成果展示的個人抱負和眼光，成爲我們理解黃錦樹寫作和論述的關鍵背景。他的創作關懷與學術眼界交織的複雜脈絡——總不自主的邊緣意識（客觀被迫或主動就位），長期雙鄉的生活心態養成的流動身份，[17]以及反骨與顛覆傳統的企圖心。

他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以小說進行的郁達夫寫作，其實可以看做一種「流亡詩學」的再生產。[18]這是黃錦樹近年創作裡一再關懷的核心主題。從一個晚清以降的集體離散氛圍中，他透過小說形式展現了種種帶有不同流亡色彩的故事，意圖重建一個馬華文學隱喻式的精神原型：南來與離心。無論是歷史性的遷徙，或因爲遠離中原的境域，或大馬政教排擠下的離心，由此生發的悼亡、憤慨、悲涼等複雜情緒，因而形成抑鬱、狂歡等不同形式的小說面目。然而，這些無法被主流移民史、政治史或文學史表述的「心靈史」，卻因此在小說寫作上凸顯出值得注意的「流亡症狀」。從華人移居與歸返的歷史中，〈開往中國的慢船〉裡錯過登船的小孩從此在赤道上馬來部落裡開始了身份的流

16 從1994到2010的17年間，他先後出版了四本論文集、四本小說集、一本散文集，主編八本小說及論文選集。期間還完成了碩士及博士論文。

17 張錦忠，〈黃錦樹的離散雙鄉〉，《誠品好讀》第55期（2005年6月），頁99。

18 過去討論黃錦樹重寫郁達夫的論述，基本上都沒觸及「流亡詩學」此一概念。包括最早以單篇論文討論此議題的Alison Groppe（古艾玲），〈郁達夫的失蹤和再現在黃錦樹的作品〉，發表於於「『文學行旅與世界想像』第三屆國際青年學者漢學會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蘇州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聯合主辦，蘇州：蘇州大學，2005年6月18-20日。該文最近以英文發表則將黃錦樹重寫郁達夫的現象放在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的脈絡思考。詳“The Dis/appearances of Yu Dafu in Ng Kim Chew’s fiction.”*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2. 2 （Fall 2010）, 161-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亡。面對宗教與種族的結構性迫害，〈阿拉的旨意〉的華裔被流放荒島；〈我的朋友鴨都拉〉吃香喝辣的投機派華裔穆斯林，最後躲進孔廟避難，更悲慘的下場是死後搶屍，被宗教局處理掉的屍體，從此朝著麥加的方向流亡，象徵了大馬政教結構裡華人荒謬和扭曲的處境；〈魚骸〉躲避馬共的政治夢魘及陰影，從此隱身在台灣大學研究室內持龜甲替文化招魂的學者，依然是一種華人從政治創傷下的文化流亡；更具象徵性意義的，要屬〈刻背〉裡勞動的神秘苦力，在背上鑿刻漢字直指華人集體的流亡身體。雖然以上故事演繹的不完全是典型的流亡概念，但這些華人主體從政教、歷史環境下感受的文化脫序、支離，以及邊緣的生存感與壓迫感，已構成馬華文學裡特殊的流亡意識，敘事意義上的流亡詩學。[19]

黃錦樹對郁達夫現象展開的書寫，等於從台灣回望一個南來歷史視野下的流寓文人個案，衍生了可以對照他自身流動位置的想像。他提醒南來是馬華文學史的「文學事實」[20]，其實間接呈現了文學播撒與流動的客觀環境，尤其這還是有著文學生產意義與創作者活動事蹟的「現場」。因此郁達夫的經歷是一個嚴肅的肉身與文化資本同時播遷的「現場」，文學史應該，卻不容易銘刻、論述的文學現象。然而有趣的是，當黃錦樹以小說形式作爲改造虛擬郁達夫的流亡體驗，除了呼應其時台灣主流的後設小說書寫風潮，是否間接暗示或聯想到漢詩表現的不足，以及郁達夫的尷尬？在小說已成文學典律的時刻，郁達夫的流亡漢詩根本不在現代文學建制的視野。漢詩意識裡呈現的經驗主體，充滿誘惑和想像的空間，因此轉變爲黃的小說寫作的魅力來源。再者，漢詩固定的古典格式，以及簡約的修辭，進入不了那佈滿細節和曖昧的地域想像。漢詩的困境在於根本解決不了郁達夫的流亡、失蹤所生發與延伸的文學意義，一種屬於地域與現場的意義。於是，小說的敘事與講故事長項，因此潛入郁達夫留下的現場。郁達夫經由小說而被重寫，進而釋放的敘事力量，讓文學現場的寫作變得更爲複雜。

在郁達夫失蹤的五十年後，黃錦樹將失蹤、死亡、骸骨三者串連爲有意義的能指，在詭異、狂誕及荒謬的小說語境裡，讓郁達夫再度復活、苟活或頹靡

19 黃錦樹在小說與論述中展示的流亡詩學現象，還涉及黃錦樹個人的文學史視域，以及對馬華文學史、馬華文化現象的意見和處理，這已屬另一個不同層面或更複雜的議題，筆者將另文處理。本文僅針對「重寫郁達夫」的脈絡，檢視流亡詩學這個面向在馬華文學系統內的可能和有效性。

20 黃錦樹，〈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香港文學》第239期（2004年11月），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再度死去，以嘲謔敘事，挑戰了郁達夫之死的歷史與文學意義。除了作爲流亡詩人，郁達夫的失蹤或骨骸在小說家眼中有著一種傳奇敘事的魅力，使得二十世紀末的馬華文學版圖，再現早期流寓者的歷史時空。「郁達夫傳奇」有了續書，意味著一種弔詭的敘事。它在質疑線性歷史，甚至顛覆文學史觀，讓郁達夫在小說的建制內重新登場，延續了那個迷戀骸骨寫作的流寓文人，真實存在的意義。

雖然郁的失蹤及生死謎團經過學者實地考證及大量回憶文章的複述[21]，基本已祛魅明朗。但如果將失蹤的郁達夫視爲具有生產意義的肉身，他不再侷限於傳記框架，反而在文學史論述及小說創作，找到新的顛覆可能。因此在黃錦樹的文學與學術眼光下，南洋文學的視域有必要重估這些南來作者在動盪歲月的肉身苦樂與寫作意識。黃重寫郁達夫的動作，以論文及小說的形式，延續著郁達夫未完成的生產。這是一次文學肉身的探勘與實踐，重新發掘馬華文學流動的「現場」意義，以及跟南來文學對話的空間。

黃錦樹的小說挑釁禁忌，出入文學史觀。黃重寫郁達夫，已是他遠離南洋，旅居台灣的階段。他的書寫位置、調動的資源和文學史觀，相對郁達夫以肉身建構的詩學想像，黃的游離文字更說明了文學播散（dissemination）結果。南方的文學「現場」，因此更顯得層次繁複，介入不同的歷史時空結構，呈現了一次跨世代的對望與錯置。

## 三、南方魅影：郁達夫的另一種生產

一九九〇年黃錦樹在馬來西亞得獎的小說〈M的失蹤〉，被認爲是他首篇展現其反思文學史佈局的重要文本。文學經典的焦慮，大作家的失蹤和尋覓，所有長久困惑馬華文學的議題，被整合爲一則懸疑且虛實交錯的故事，爲黃意圖整理的文學史觀埋下伏筆。小說以尋找一篇在文學獎比賽中驚爲天人的作品，展開馬華文學史上的作家與作品搜尋，一場文學大師（Master）的訪查之旅。失蹤的郁達夫正藉此縫隙走進了馬華文學史，成爲小說中可疑的大師之一。黃首次讓郁達夫復活（他有多篇小說裡處理了郁達夫，詳後），成爲馬華文學界焦躁尋找的大作家，並意有所指的羅列一群被調侃的馬華及台灣作家當主角和配角，戲謔語言背後其實蘊含著一場攸關文學史與創作閱讀史的文學清理。

21 最著名的研究成果，當屬日本學者鈴木正夫訪問了當年的日本憲兵，證實郁達夫的遇害。另外與郁達夫一同流亡的胡愈之、巴人等文人也寫過追憶文章，詳述逃亡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文學獎（文學典律）的後設寫作，呈現了黃錦樹長期的關懷。小說裡的失蹤大師，大概可以延伸爲後來作者在馬華文壇引爆論爭的「馬華文學經典缺席」。[22]這場論爭最核心的問題是，沒有大師，欠缺經典，文學史的論述如何可能？文學建制並不健全，「經典缺席」因此一直是馬華文學的夢魘，進一步浮現爲黃小說裡的「症狀」。

郁達夫在一九三九年初應溫梓川等檳城文藝青年要求回應馬華文學議題，提出的〈幾個問題〉也引發了論爭。[23]其中郁達夫呼籲「南洋若能產生一位大作家，以南洋爲中心的作品，一時能好好地寫它十部百部，則南洋文藝，有南洋地方性的文藝，自然會得成立。」[24]郁達夫召喚大作家，變成了黃小說裡竭力調侃的一種馬華文學的病理結構。黃挖苦「大作家」或「馬華文學經典」，其笑謔姿態，似乎也有其自成一格的理由。〈M的失蹤〉展示一齣作家評論家諸公上場演出的「文學史倫理劇」，竟以鬧劇的形式包裝，最可信的文學史「現實」，卻不斷引起「笑場」，文學史頓時變成虛擬的文學演出。存在的典律或待建構的典律，都已不是黃小說裡準備提供的答覆。

黃錦樹接著創作〈死在南方〉（1992）、〈補遺〉（1998）、〈大河的水聲〉（1999）、〈刻背〉（2001）[25]等作品都先後見到郁達夫的身影。他等於用了一組作品將郁達夫穿插爲小說題材或背景，有意識的強調郁達夫個案可能釋放的一些歷史幽暗面。其中又以〈死在南方〉及〈補遺〉環繞在郁達夫的失蹤及後續荒誕事蹟，展開狂歡般的想像與慾望地誌的書寫。

在黃錦樹建構的馬華文學視域裡，郁達夫的南來及失蹤卻可能象徵著馬華文學的起源場景：曖昧的主體及肉身創傷。從晚清以降，南來基本表徵了流寓或流亡的喪亂經驗。當中流寓者無數的身體苦痛和災難，精神在異地的誘惑和慾望，往往只是個體的言說，無關文學史敘述。因此，他在論述裡特別總結了

過。詳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1996）。

22 關於「經典缺席」論爭的來龍去脈與相關文章，詳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編，《辣味馬華文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23 這場論爭的意義和討論，詳林錦，《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同安會館，1992），頁190-196。楊松年，〈從郁達夫〈幾個問題〉引起的論爭看當時南洋知識份子的心態〉，《亞洲文化》23期（1999年6月），頁103-111。

24 郁達夫，〈幾個問題〉，收入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頁482。

25 〈M的失蹤〉及〈死在南方〉收入黃錦樹第一本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1994）。〈補遺〉、〈刻背〉、〈大河的水聲〉則收入黃錦樹第三本小說集《由島至島》（台北：麥田，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郁的三重形象：感傷的行旅者、零餘者、骸骨的迷戀者。[26]這裡提示了馬華讀者有一具無法繞過的慾望軀體，那正是南來文學裡蠱惑的文人形象。藉由這三個形象，黃錦樹現身說法道出小說寫作的初衷。這類似李歐梵指稱郁達夫乃孤獨的旅人，[27]體現著不確定、毫無目的的漂流與停駐。感傷、頹靡、飄泊構成一組自我形象的形塑。如此說來，流寓者的意義，重新提出了馬華文學流動的歷史座標。而關於郁達夫的再生產，不過是搬演魅影般的流寓者幽靈，召喚南來的歷史與記憶。

小說家敘事本在以假亂真。黃錦樹演繹失蹤後的郁達夫傳奇，有意無意間展露出他對寫於郁達夫失蹤後的長篇連牘紀念和追憶文章，一種嘲謔式的顛覆。無論是懷念、揭秘、攀交情，甚至是帶有學術性質的考證、文學批評或評價，多少都是一而再的消費郁達夫遺留在南洋的肉身傳奇。

〈死在南方〉是黃錦樹以後設小說形式，延續了針對郁的失蹤之謎進行廣泛寫作的另一種虛擬敘事。小說以第一人稱視角，仿照口述歷史腔調，重建了逃難中化名爲趙廉的郁達夫可能出沒於戰後防空洞的現場。小說架構趙廉流亡生涯片段的軸線，主要是以一連串重新發現的殘稿文字的斷片，質疑郁失蹤後可能生存的事實及狀況。尤其小說中出現的文稿對應著郁南來前的小說局部情節，更進一步操弄了敘事技法，以小說驗證小說，試圖闡釋解讀郁的幽靈如何重現於敘事，卻同時透過敘事指涉郁的失蹤／死亡在經驗意義上無法比對的客觀侷限。小說同時設下一個隱喻般的結局：郁／趙廉參與了日軍朋友爲其安排的替身處決，以致交換的條件是永遠的失蹤。失蹤變成一種被迫的交換，變賣身分以苟活，面對歷史債務（當日軍的翻譯？變相的漢奸？）必須償付的代價。小說看似故弄玄虛，但意有所指的敷衍郁的未死傳奇，無異是設想流亡在歷史裂隙的一種存有狀態。相較那些以研究資料名義集冊的悼念、追憶及考證文章，小說家之「虛言」顯然難登大雅之堂。但也正是小說中的引文及敘事穿插的論述形式（那以假亂真的註解），促使後設故事另闢了一個歷史現場，填補客觀「史實」的上下文，指涉寓意深刻的郁達夫在地想像，成爲馬華文學的一道內在流亡風景。

黃的小說技法虛實兼備，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後郁達夫」現象。後設佈局是敘事策略，但小說家自己忍不住作了旁白：「它是讓某些事物得以存在、顯現的一種權宜方便。」[28]換言之，小說後設的不是郁達夫失蹤，而是郁達夫被

26 詳注15黃錦樹前揭文。

27 李歐梵，〈孤獨的旅行者〉，氏著《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1996），頁121-125。

28 黃錦樹，〈自序〉，《夢與豬與黎明》，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展示爲一種狀態，一種以郁達夫失蹤的個案所意味的錯置主體，釋放出時空與存在經驗的荒謬感。小說雖然是續寫郁達夫傳奇，傳奇的意義不過是說明了其「異」，異化後的異域主體經驗，或身體感。骨骸可以看做是身體感的極端展示，驗證曾經存在的生命。郁所遺存的屍身，終究不知所蹤，消隱在炎荒之地。但郁迷戀「骨骸」，另外一種漢詩形式的存有，反而成爲他流亡生命的最後見證。

黃錦樹在世紀末重新演繹郁達夫的屍身，不妨視爲對錯置身分的歷史探索。黃旅居台灣超過二十年，從東北亞的島嶼回望赤道上的南洋半島，作品裡常見多重辯證的流離身影。他在研究生時期寫作〈死在南方〉最大的顛覆意義，在於以斷簡殘篇的小說遺稿方式，延續了郁來不及以小說記載的身體苦難或流亡經驗。郁達夫的「失蹤」成功讓「缺席」的主體，成爲現代文學「官方」論述下完整「在場」的愛國作家形象。但黃偷換了郁「失蹤」的神聖意義，將「失蹤」變成不得已的苟活、偷生，甚至頹廢、莫名其妙的錯置。或許更精確的說法，黃的調侃和質疑，針對的不是郁達夫，而是郁背後一整套文學論述的「虛構」：少了血肉和流動的「現場」。因此從〈M的失蹤〉到〈死在南方〉，題目內的「失蹤」和「死」雙重闡釋了郁達夫在馬華文學系統內的存在意義，兼及對文學典律和文學肉身的重估。

黃展開的郁達夫敘事，從馬來半島延續到台灣寶島。相對健全的文學和學院建制，黃從論述與小說雙管齊下，讓他的「郁達夫論述」更爲完整。這同時形成一種文學的游離與播散，另類的文學對話。於是，郁真正留存的身體感反而轉化爲論者或小說家對想像的屍身的再創造，或只能從郁晚年留存的漢詩，辨識他最後的心靈與肉身體驗。

郁達夫畢竟以小說揚名五四文壇，但那可以負載更多訊息的敘事文類，抽離了他最終的人生現場。這不也說明亂離之世，虛構的文類總顯多餘，難以企及內在的生命慾望與遭遇。因此，黃錦樹以小說模擬郁的主體經驗，像是臨近骨骸，[29]完成跨代的續寫或改寫。那以骨骸象徵的身體感，終得以小說的形式補充了血肉，尤其重現生命後期那來不及交代的細節。這其實不是郁達夫生命的盡頭，而是郁達夫傳奇的起點。

其中〈死在南方〉出現一組有趣的對照。黃以郁小說中人物的死亡，死在連串的沒落、衰敗、恐懼之中，代換郁達夫的死裡逃生。如同小說虛構的那一

29 骨骸一直是研究郁達夫者感興趣的部分。鈴木正夫當年查訪郁的失蹤經過，也認真尋找過郁的骨骸。而近年官方形式的郁達夫學術研討會，更嚴肅的向世界華人發起找尋郁達夫骸骨的呼籲。接近骸骨，變成一種集體的想像郁達夫的慾望和形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交易，以消失換取死亡。死亡只會成爲一堆骨骸，而消失（失蹤）則如同雷達上突然消隱的座標，不知去蹤，生死未卜，從而搜尋的範圍無限擴大，或像是百慕達海域的神秘檔案，在不同時空都有出沒可能。這生產出更大的慾望空間，好比馬華文學裡兩個帶有原型意味的起源性場景：一個象徵光輝南遷或歸航的鄭和下西洋。那是南來遷徙版塊上最輕易調動的資源，移民史的歷史現場。另一個是郁達夫的失蹤，一則象徵大作家南來，亂離、死亡、頹敗的流亡蹤跡。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現場」，釋放的文學想像及文化慾望，基本上刻劃出中國境外流寓、移民、流亡的南洋史。箇中複雜的含意，也因爲郁的失蹤，讓南來變成一個開放性的想像。

小說題目「死在南方」還有典故出處。那是台灣日據作家龍瑛宗的作品，假以名家之篇以成馬華文學選集之貌。[30]作者期待典律之用心，更能對照前者釋放的慾望深淵。南方曾經作爲拓荒者開墾之地與流亡荒野，道盡了多少個體錯置的經驗。郁達夫的失蹤，不過是巨大典型的文藝象徵，重寫或復活南來之路的軌跡。埋骨，已是亂離之身的終點。那寫入五四文學史的郁達夫之死，也只是一則浪漫的南方想像，而且已是句點。南方成了郁達夫之死的前綴，試圖形容，但非關主詞。於是，黃錦樹刻意在〈死在南方〉的斷簡裡拼湊出郁達夫意味深長的背影——「他以不斷的歸來做最決絕的離去」。亂世苟活，存身無處。郁以文字的幽靈重現，流連於南方的身世，卻象徵他早已遠離的現場。小說藉由骨骸以重構郁達夫的身體感，不實爲打造一把開啓南方的鑰匙。

## 四、銘刻的可能：肉身與骨骸

肉身與骨骸是一組相關，卻又對立的概念。肉身銷毀，骸骨才開始發生意義。客觀說來，骸骨確實發揮著一種實證的語意功能，指向遺跡、現場以及化作歷史的能指。當年鈴木正夫執著的追蹤郁的失蹤死亡真相，熱烈尋找骸骨。二十一世紀在郁的故鄉富陽，以郁的名義設立的中學的全體師生發表了「呼吁全球華人尋找郁達夫遺骨」倡議書，[31]意圖召喚愛國作家的歷史幽靈，以烈士立碑。然而，當集體大眾想像尋找骸骨重建歷史記憶的同時，郁達夫生前強調「骸骨迷戀」卻提醒著另一種有效的骸骨形式——漢詩。這種精粹的文化形式，成爲郁達夫活生生的精神載體。

30 《夢與豬與黎明》小說集裡有多篇文章沿用或轉化名家篇名。作者在自序裡也作了說明。這種形式的設計，在第三本小說集《由島至島》更是極致操演。

31 《每日新報》2000年6月27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換言之，文字是郁達夫最後留下的骸骨。不論是在現代文學建制內顯得尷尬的漢詩，或南洋流亡、流離的移民生活場景，甚至獨立建國後馬來政教霸權下的社會結構；相對更大群體的文盲、勞動階層、社會的少數族裔，這些普遍的華人生存現象，使得骸骨與文字隱含的連結明顯有著一種詭異關係。文字終將成爲骸骨的銘刻，一種生存經驗的最後見證。又或在南洋移民社會普遍難以掌握文字以表述自身經驗，只有少數菁英可以掌握精緻文字的前提下，文字才可能跟移民的精神發生連結。因此，文字的功能，是一種骸骨的想像？還是以肉身的樣態寄存？這具體鋪陳了郁達夫個案延伸的骸骨與肉身的對照。這涉及了流亡詩學的一個關鍵界面，精神是依附於肉身，或對應骸骨，成爲弔詭的辯證。

黃錦樹在〈補遺／沈淪〉[32]一文極力推演其中的辯證關係，展現懸疑、幻魅的歷史及中國性想像。小說設計「作家身影」紀錄片的攝影小組，在接獲神秘日本男子高津關於尋獲郁達夫最後蹤影的重要出土證據後，從台灣飛往印尼進行調查和錄製的補遺。當時的印尼排華暴動正盛，攝影隊藏住在陰暗旅館，外面風聲鶴唳，長久在印尼生根的激烈種族衝突頻頻上演。但高津尋獲的證據竟然是一綑日軍南侵時發行的鈔票，俗稱香蕉票。更驚人的發現是鈔票上出現了可辨識的郁達夫筆跡。比對鈔票的字跡內容，他們幾乎可以確定，那是敘述郁達夫在失蹤後的生活片段，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腔調，描述自己在日軍戰敗後被兩名日本軍官禁足及監視於荒島的經歷。換言之，這顛覆了過往對郁失蹤死亡的推測。小說後半部更進一步張揚郁存活的慾望，如何沉淪於荒島娶妻生子且成了回教徒，又或以另一結局描述其最終進入海盜窩，在海盜女頭目的女王風範下尋得庇蔭，頹靡啃噬著那骸骨般的僞古典中國世界。

作爲一則補遺，小說聲東擊西，虛張聲勢，以嘲謔式的語言，設定爲狂歡時空體（chronotope），[33]呈現沈淪的肉身世界。黃錦樹一邊直陳華族移民面對

32 此文最初發表，題目為〈零餘者的背影〉。收入小說集中則改為分別以「沈淪」及「補遺」的題目出現在小說集的目錄與內文。其實，作者意圖以形式設計為小說的題目製造對應關係。全書收入的小說都有兩個題目，皆可對應馬華文學史上重要的代表作。作者虛擬「馬華文學史」選集的意圖，及其在該書封面安排兩個書名等等的形式操作的寓意，詳拙作，〈歷史與敘事：論黃錦樹的寓言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9期（2006年6月），頁143-164。

33 這裡參照了巴赫金（Bakhtin, M. M.）對小說時空形式的討論，尤其以拉伯雷的小說為對象的研究，提出小說時間和空間交織形塑的時空體特質，決定了具體的體裁和風格，在文學史上成為一個有效的理解和分析範疇。詳巴赫金，〈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1998），頁274-4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族政治的生存困局及錯置，另一邊直搗黃龍，曝顯弔詭的中國性成爲形式幽靈。小說等於用了兩道敘事軸線劃出南來的縱深，更顯得亂世存身既是苛求，又是一場荒誕劇。尤其小說選擇用被遺棄的戰時香蕉票展開敘事，提醒敘事之「補遺」，根本是亂離的權宜。這是名符其實的遺棄敘事的追捕。當然也是黃錦樹針對郁達夫生命最後的喪亂，需要被填補的地誌慾望書寫。

小說描述在日本軍官仁慈的網開一面下，戰後的郁達夫不必死而是被囚禁荒島。回到一個跟荒島土著共生的最初流離場景（南來的原始場景？），兩個監控的日本人因其長官熱愛文學，逼著郁達夫爲自己最後的放逐歲月，以小說形式留下文字記錄。囚於荒島竟是爲了書寫，這荒誕的放逐理由有著複雜的脈絡。事實上，郁的最後生命光景是在日軍入侵南洋期間流亡避居蘇門答臘。但敘事如何捕獲流亡經驗，或流亡怎樣成爲敘事的慾望，無形中已是肉身與文字的辯證經驗。黃錦樹設計郁達夫用小說替自己留下最後的書寫，其實回應著現實裡的郁達夫在孤獨行旅中，只能以漢詩經營的自我形象。漢詩裡的身影貌似流亡，趨近放逐，以致那總是哀毀自傷，難以自抑。

郁在失蹤的前幾年幾乎以古典漢詩記載喪亂，十一首的〈亂離雜詩〉及〈無題〉四首，都是用感傷時間記錄生命最後圖景。這說明漢詩形式，有效安頓和表述流離狀態下的慾望身軀。漢詩刻畫主體的片段經驗，以曠古共享的原始情緒，召喚避難流離的抒情型態。郁達夫對寫作漢詩已自我調侃爲骸骨迷戀，在新文學的眼光下更被視爲戀物儀式。不過，〈補遺／沈淪〉中出現的補遺不是漢詩，卻是小說。黃錦樹以小說形式從郁的肉身入手，至少在象徵意義上替郁達夫不曾爲南洋留下的新文學遺產，拓展其另一層的生產意義。

另外，黃在小說裡設計兩段式的寓言結局，各有不同指涉。第一段結局是當攝影隊終於在一座私人購置的荒島找到郁的埋骨之處，攝錄的「作家身影——零餘者的嘆息」有了最好的收尾。郁終老於荒島，以皈依回教的信道者身份，仿朝聖之姿下葬。入鄉隨俗的郁跟島上姑娘結婚生子，流離的身軀找到終極的歸宿。黃錦樹對第一段結局的處理，提供了許多聯想。郁的骨骸終於找到了他的神，入土爲安，還是戲謔式的調侃流亡者莫名其妙的荒誕結局？作爲回教徒的郁達夫等於質問著南來的終點或唯一的終點：信道了嗎？而骨骸權宜的以朝聖之姿入土，完成了信道者的儀式，流離之軀的安頓。漢人移民南洋的集體命運，似乎帶有悲劇味道的宿命，郁達夫已先行完成。這是重寫失蹤郁達夫的最大反諷，帶有種族政治的狂想。郁達夫由此成爲真正的南方作家，充滿無庸質疑的南洋色彩。

這個結局恐怕是黃錦樹最詭異大膽的設計，卻內含一股憂傷的力道。但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較於黃錦樹另一篇充斥穆斯林政治隱喻的〈阿拉的旨意〉，[34]則強烈質疑信道者是先驗的被揀選。漢人移民當了回教徒，在種族政治內也是次等回教徒。這不正好提醒讀者，回教徒郁達夫的安排根本是一場鬧劇。前者是以寓言化角度將南來華族遭遇異族及宗教強勢規範下的不堪處境懸置，變成一則充滿嘲諷力量的政教寓言。但後者等於進一步將現實中仍屬失蹤（沒有埋屍地點，沒有骨骸）的流亡者郁達夫虛構成一則黑色狂想曲。換言之，信道者儀式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癡人說夢。同時在小說主要的敘事聲音之外，攝影隊身處的印尼正發生日漸緊張的排華種族政治。這根本暴露出南來者與回教徒仍是移民政治及移民史上懸而未解的困境。小說結局將郁達夫變成回教徒，黃錦樹的補遺確實詭譎，笑聲曖昧。這讓書寫成爲一種歷史姿態，以狂歡敘事清理歷史的糾葛。

嚴格說來，補遺到這裡只回應了南來的第一層敘事。那是「作家身影」紀錄片模式的線性時間敘事，從生到死的完整紀錄。然而小說卻在此來了一個峰回路轉。準備搭船離開荒島的攝影隊，竟遭遇海盜挾持而進入到一個太虛幻境般的僞中國世界，並遇上酷似郁達夫的老者。郁達夫的生死又再度變成謎團。小說的敘事轉折顯得突兀，似有斷層。但我們不妨理解這是敞開第二道敘事的鑰匙。

相對前半段以紀錄片式的考查追蹤郁達夫最後的藏身之處，後半段的敘事重點轉入早已縱橫馬六甲海峽的海盜故事，甚至虛擬具有景觀（landscape）意義的古典中國符碼。小說顯然刻意帶入一個橫行境外中國最早的漢人職業群體——海盜。那些在南方海域活動的海盜群體，本來就是漢人境外行旅的一種延伸。攝影隊被綁架帶到海盜世界，進入了布置成古中國的樓台亭閣景觀，身著唐裝的海盜像古裝片的演員。這些安排隱約突出作者的言外之意。南來遷徙及移民中的「遺民」狀態（或相對印尼排華氛圍下的「夷民」），總以中國性的消費作爲認同政治。換言之，在這群人身上並存了遺民、移民、夷民的複雜身份想像，[35]鋪陳出一條南來移民的歷史軌跡及精神意義。

小說之前安排郁達夫埋骨荒島，只是搬弄移民政治的諷喻。但敘事一旦進入海盜之家，操作的元素則導向遺民詩學。小說將所有記載於香蕉票的補遺毀於大火，如此一來可以補遺的不再是敘事，而是肉身。小說最後用誇張詼諧的腔調，在日本研究者的考古及收藏癖上作文章，調侃他們成功將荒島上郁達夫

34 收入《由島至島》。該小說在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都以種族及宗教的禁忌為由，不得刊載。

35 王德威教授以「三民主義」指稱移民、遺民及夷民三種海外華人彼此消長的身份及認同。詳氏著，〈壞孩子黃錦樹〉，收入黃錦樹，《由島至島》，頁1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屍身掘出，變成了日本博物館的標本。[36]同時屍身上男性性徵的三寶被搶奪流落到不同收藏家的手上把玩，將其屍化、戀物化、古董化，從遺民氣息的腐朽誇張延展到性的狂想。性嘲謔及狂歡的極致，不也暗喻著遺民詩學的力比多（libido）？郁達夫生命晚年以肉身形式（嫖妓、再娶妻生子、寫作骸骨般的漢詩）展演的流離歷程，處處是沈淪的身影。

最後，小說的敘事節奏再變，以蔣宋美齡在異邦叼著用郁達夫的一寶做成的煙斗，竭盡所能影射描繪這一批民國流亡政權的政治貴族及文化遺老，活在老中國庇蔭下的僵化、物化傾向。其中尖酸嘲謔比起張愛玲的「泡在酒精缸裡的孩屍」（〈花凋〉）更有過之，並增添淫猥的氣味。小說在挖苦郁達夫感傷浪漫的沈淪本色之餘，卻也抵銷了郁達夫失蹤所引發的歷史效應，鑿開一個死亡與淫猥並存的慾望深淵。回到我們剛才提起的小說第二道敘事的結局，海盜築起的僞古典世界等於是一場「表演中國性」[37]的布景，垂垂老矣似假似真的郁達夫最終棲身於母儀天下的海盜首領老女人身邊。一輩子周旋在女性之間的郁達夫，終於名符其實的以沈淪告老，沈淪在中國性的憑弔儀式。

這架設的第二層敘事策略，正大光明的把「補遺」留給了肉身。借用黃錦樹自己的說法：

> 歷史原即是一樁收集、處理屍骸的活動。而在文字（精神）的背後終歸是血肉；文學、身體、文字與死亡——作為棺木的馬華文學史體制裝不下這一切——屍首並不經驗實證的在場。這筆遺產，只有文學，只有書寫才有可能承接。[38]

郁達夫的骸骨成謎，變爲一場歷史慾望的力比多敘事。各種妝點郁達夫失蹤之謎的考證書寫，在黃錦樹的概念裡充其量不過是一場文物考古，彷彿一場古典中國的還原與再現。黃以小說文類所規範的虛構契約，爲這場考古儀式做了一次敘事的重現，骨骸還原爲日本博物館裡的屍身標本，甚至遺留三寶在異

36 黃錦樹將郁達夫標本化的作法，同樣出現在〈大河的水聲〉。那篇小說描述一位馬華大作家「茅芭」（茅盾+巴金？）的離奇死亡，最後竟以標本形式出現在有收藏癖的馬華民間研究者的密室。小說嘲謔了馬華大作家都是密室內的「不朽」標本，意在批判馬華文學界長期存在的自我吹噓，相互抬舉的「自我經典化」陋習。郁達夫赫然出現在標本行列之中，加劇了馬華作家「經典」份量的效果（笑果）。

37 黃錦樹以為馬華社會長期根植的中國性帶有一種表演性質。那也是移民社會對中國性的想像形式。詳氏著，〈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1998），頁93-161。

38 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頁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邦繼續沈淪流浪。這是黃錦樹以小說逼近中國性最淫猥的憑弔，郁達夫的生死之謎已成生死之慾。由此我們可以認定黃錦樹建構的已是一種流亡的遺民詩學，且以狂歡的體式爆破抒情傳統溫柔敦厚的一面。郁達夫的屍身，或以漢詩鑄造的詩身，恰是彰顯晚清以來的現代性風暴中堆疊的歷史殘骸，中國性力比多的原址。在此層面上，黃等於用小說雄辯式的印證郁達夫可視作南來的象徵性起源。

回到郁達夫延伸的骸骨與肉身的辯證，黃錦樹藉小說敷衍骸骨的極致想像，提出文字的延異、再生產的多重可能，其實也顧慮著骸骨背後表徵的文字，可能與精神之間的脫落。於是，小說的「補遺」最終還原到肉身，暗示著主體精神的展示，在亂離與文化建制飄搖的移民社會，終究是以肉身爲仲介。因此，另一篇小說〈刻背〉裡出現在南天酒店的郁達夫，成了小說中神秘角色福先生的漢字夢魘。這個沈淪到南洋的新文學大作家，因緣際會成了極具蠱惑性的文字象徵，暗示著流亡的漢字的可能歸宿。我們熟知現實中的郁達夫選擇精緻的漢詩，將自身拋置到一個歸返的文化系統，儘管肉身的流離已不知所蹤。但黃的策略，則是描述了對漢字與中華文化癡狂的老外福先生，選擇了殖民者加諸苦力的殘酷手段，對不識字的苦力「文身」，將漢字刻入苦力的背上。我們可以看做這是作者大膽實驗的一次「漢字的流亡方案」，以此將「道呈肉身」作最具體的表現，對馬華文學內的文化記憶和移民肉身的「銘刻」做了最具想像力的實踐。小說裡爲這套策略作了一次理論性的說明：

> 一種不可替代的革命性的現代主義方案，用最現代的文字形式、活生生的載體、立即性的發表、隨生命流逝的短暫性——瞬間性的此在 dasein 而存有、絕對不可翻譯的一次性、絕對沒有複本、而徹底的超越了中國人的中文書寫侷限於紙或類似紙的無生命載體。[39]

這是一次最赤裸裸展示與強調肉身的意義，以文身的痛，隱喻性的刻劃了無數具流亡在南洋現場的移民主體。這些帶著文身的苦力是小說裡追蹤的一個即將湮滅消逝的族群，意味著流亡的漢字與無數南來的沈默無聲的勞動者，構成一種最血淋淋的文化招魂，一種符咒般的肉身胎記或印記。換言之，黃錦樹透過小說表現了一種賦形流亡經驗的最佳形式，郁達夫身影成了將肉身視作無限想像的一個起點，或馬華文學最具原型意義的創傷經驗。

考古是一場鞭策史料帶有實證意味的敘事。但敘事本身蘊含的想像與魅力卻容易在論文規範裡消失無蹤，或成爲不甚起眼的註腳。那些郁達夫生命最後

39 黃錦樹，〈刻背〉，《由島至島》，頁3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片段，殘存在各人回憶紀念文章裡的需要補遺的素材，如今在黃的小說裡被狂想地搬演了一次。郁達夫的迷戀骸骨，到了黃手中倒成了瘋狂的骨骸。箇中的黑色幽默及鬧劇成分，若認真說來，可視爲境外中文的一場現代性的慾望敘事，發出其歷史沈淪的曖昧笑聲。那何嘗不是黃錦樹一貫的小說腔調。而郁達夫真正留給我們的已是「作家魅影」，一場可以開發的慾望地誌書寫。

如果郁達夫的南來失蹤死亡是整個文學播遷的一種弔詭，黃錦樹的改寫卻提醒我們注意他「北上」台灣的位置，這也是流動的文學事實。台灣是相對馬華而言更豐厚的文學場域，但在大中華的文學版圖內還是邊陲。他在這個中國境外的南方島嶼寫作，以自身流動的邊緣意識去反思演繹郁達夫的流亡身世，島與島之間形成文學的隔代遷徙和對話。這是雙鄉寫作意識的一部份，當然更屬於未曾停止的區域文學流動。因此他從郁達夫身上採取的虛構敘事，展現出地域書寫的張力，以辯證文學現場和歷史記憶的關係。這恐怕是另一次郁達夫神話的開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王孫、熊融，《郁達夫抗戰詩文鈔》，福州：福建人民，1982。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1998。

林錦，《戰前五年新馬文學理論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同安會館，1992。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編，《辣味馬華文學》，吉隆坡：雪蘭莪中華大會堂、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2002。

陳福亮，《風雨茅廬：郁達夫大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2004。

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上海：上海遠東，1996。

（二）單篇論文

〈呼吁全球華人尋找郁達夫遺骨〉，《每日新報》2000年6月27日。

巴赫金（Bakhtin, M. M.），〈小說的時間形式和時空體形式〉，《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1998，頁274-460。

方修，〈《郁達夫抗戰論文集》序〉，收入王自立、陳子善編，《郁達夫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2010，頁471-474。

王任叔，〈記郁達夫〉收入李杭春、陳建新、陳力君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杭州：浙江大學，2006，頁58-88。

王德威，〈壞孩子黃錦樹〉，收入黃錦樹，《由島至島》，台北：麥田，2001，頁11-35。

李歐梵，〈孤獨的旅行者〉，《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1996，頁117-137。

林幸謙，〈郁達夫的血肉紅塵〉，《叛徒的亡靈》，台北：爾雅，2006，頁54。

胡愈之，〈郁達夫：愛國主義者和反法西斯的文化戰士〉，收入李杭春、陳建新、陳力君主編，《中外郁達夫研究文選》，杭州：浙江大學，2006，頁206-209。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與失蹤〉，收入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三聯，1985，頁41-78。

郁達夫，〈《星洲文藝》發刊的旨趣〉，收入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1990，頁596-5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郁達夫，〈胡邁來詩，會有所感，步韻以答〉，《郁達夫全集‧卷九》，杭州：浙江文藝，1992，頁223。

郁達夫，〈幾個問題〉，收入郁風編，《郁達夫海外文集》，北京：三聯，1990，頁480-485。

郁達夫，〈骸骨迷戀者的獨語〉，《郁達夫全集‧卷三》，杭州：浙江文藝，1992，頁82-84。

孫逸忠，〈郁達夫戰時對星馬華文文學的貢獻〉，收入莊鍾慶編，《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福建：廈門大學，1991，頁146-160。

高嘉謙，〈歷史與敘事：論黃錦樹的寓言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9期（2006），頁143-164。

張紫薇，〈郁達夫被害前後〉，收入王潤華編，《郁達夫卷》，台北：遠景，1984，頁337-367。

張錦忠，〈黃錦樹的離散雙鄉〉，《誠品好讀》第55期（2005年6月），頁99。

黃錦樹，〈M的失蹤〉，《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1994，頁10-42。

黃錦樹，〈大河的水聲〉，《由島至島》，台北：麥田，2001，頁41-84。

黃錦樹，〈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1998，頁93-161。

黃錦樹，〈死在南方〉，《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1994，頁182-210。

黃錦樹，〈自序〉，《夢與豬與黎明》，台北：九歌，1994，頁1-6。

黃錦樹，〈刻背〉，《由島至島》，台北：麥田，2001，頁325-359。

黃錦樹，〈華文少數文學：離散現代性的未竟之旅〉。《香港文學》第239期（2004年11月），頁4-8。

黃錦樹，〈補遺〉，《由島至島》，台北：麥田，2001，頁267-290。

黃錦樹，〈境外中文、另類租借、現代性：論馬華文學史之前的馬華文學〉，《文與魂與體》，台北：麥田，2006，頁79-104。

楊松年，〈從郁達夫〈幾個問題〉引起的論爭看當時南洋知識份子的心態〉，《亞洲文化》第23期（1999年6月），頁103-111。

劉納，〈舊形式的誘惑：郭沫若抗戰時期的舊體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3期(1991)，頁188-202。

鍾敬文，〈《天風海濤室詩鈔》跋語〉，收入楊哲編，《中國民俗學之父》。合肥：安徽教育，2004，頁1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英文論文

Alison Groppe.（古艾玲） “The Dis/appearances of Yu Dafu in Ng Kim Chew’s fic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2. 2 (Fall 2010), 161-1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Skeleton and Inscription: A Study of Ng Kimchew, Yu Dafu and Exile Poetics

Ko, Chia-cian*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how Ng Kim Chew, a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in Taiwan who rewrites Yu Dafu's death in Nangyang, delineates the topological writ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displaying mobility and the transcendent natur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Yu Dafu, a legendary writer from China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went missing in Sumatra in 1945, leaving his death an unresolved mystery. Several decades later, Ng Kim Chew, through meta-fictional practice, rewrites Yu Dafu's legend in Nanyang, subverting the linear read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constructing an alternative literary scene. The discussion is conducted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o missing, death and skeleton form a unified signifier to represent the history and literary context in which early exiles live? How does Ng Kim Chew's rewriting of Yu Dafu contribute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Yu Dafu, Ng Kim Chew,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skeleton, exile poetic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